

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历史道路

□ 孙 信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民进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一部分文化教育出版界人士和一部分工商界人士所创建。在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实践中，民进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扬民主精神 促进民主政治

抗战结束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以马叙伦、王绍鏊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推行内战独裁政策极为愤慨，同上海人民和各界爱国进步分子一道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斗争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团结的力量，大家希望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以便团结起来，更有力地进行斗争。于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诞生了。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共26人，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界的爱国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会议主席马叙伦在大会报告中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取名为民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会议通过了本会简章等四项重要决议，宣告民进正式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

为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1946年1月2日，民进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会议选举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11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公开宣布了民进的政治主张，驳斥了国民党“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指出现时的中国，必须首先实现民主政治，然后才能真正统一，“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加紧步伐，集中力量，争取民主，实现民主。

从此，民进以一个有纲领、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上接1版头条）

注重从本质论高度 把握我们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根本定位,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前提

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建党兴党强党，坚持讲政治和永葆政治本色既是我们党最为突出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质，也是我们党能够确立鲜明的初心使命并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政治本质上的根本前提。

回顾我们党诞生以来近百年的奋斗历程，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成就与经验，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只有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我们党才能始终

（上接1版二条）

坚守初心使命就要始终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是深圳的灵魂和生命，是特区发展的动力源泉。深圳始终坚持创新驱动、质量引领，率先把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打造了引领时代的“深圳质量”“深圳标准”“深圳品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肯定：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开展民主和平运动 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

民进成立后，立即以战斗的姿态，积极投入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民进创建之初，正是旧政协召开之时。马叙伦在会议召开之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目的，是想让政治协商会议“做他的猫脚爪，借此叫中共放下武器，和赶快召集原有的国民大会来替他捧场，再借宪政的招牌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仍还是挂羊头卖狗肉!”会议开幕第二天，民进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提出了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等7项具体建议。政协五项协议达成后，民进领导人当即发表文章，指出会议“虽然有了成果，但是和我们的希望距离还远”“民主基础人权自由还是不曾兑现”，因此民主运动的责任“不但不曾解除，而且加重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开叫嚣要破坏政协协议后，马叙伦连续发表了《当前一个严重问题》等3篇文章，愤怒指出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是要使全国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轮子碾坏”!

为促成政协决议案之完全彻底实现，1946年3月17日，民进召开了第四次会员大会。大会明确了两项具体工作：一是唤起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二是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旨趣相同的人民团体共同战斗。依此精神，民进一方面组织参与各界民主人士和大学生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方面努力促成民主力量的大联合。

在民进的精心策划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5月5日，民进等上海52个团体组织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6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民进和其他各界人士164人联名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大会（又称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大会在北火车站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0余万人。当马叙伦率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殴，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身受重伤。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也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下关事件”使民进会员深刻认识到，向国民

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我们党也深刻地认识到，坚持讲政治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当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讲政治”问题上，始终保持高度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进而在此基础上明确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我们党的根本政治定位，坚持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历史进程，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在思想政治上毫不含糊地坚决讲坚定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毫不动摇地坚决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与时俱进地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了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行。新时代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在本质论的层面上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根本政治前提。

恩格斯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眼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大命

题的提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点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重大命题的创造性就在于，它不仅真实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固本开新的奋斗历程，深刻地表征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负人民、守正出新的信念信仰，鲜明地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与时为新的雄心壮志，同时更是从总体上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砥砺前行、行稳致远、可大可久、善作善成的永恒精神法宝。

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了民进的坚决拥护和热烈响应。5月5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以及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与各界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民进还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中国的议事日程，到今日已不再仅是新民主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怎样做”的问题。“五一口号”23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整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它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一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宣言》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作出的重大历史选择和转折。

民进在迎接全国解放的同时，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马叙伦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在会议发言中，马叙伦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表示要在历史的转折中改造自己，用最大的努力，从事经济、文化建设，与全国人民和各党派一道，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1958年6月5日，长期卧床休息的马叙伦在护士的帮助下走下病床，留下了最后的字迹：“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既是马叙伦对自己一生革命生涯的高度总结和升华，也是留给民进的政治嘱托和宝贵财富。

响应“五一口号” 迎接新中国诞生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开始作最后的挣扎。7月4日，国民党政府悍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把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称作共产党的“叛乱”进行镇压。国民党训令其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实行对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对中层下层分子“一律格杀不论”的政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民进决定暂时隐蔽，转入地下活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

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得到了民进的坚决拥护和热烈响应。5月5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以及其他党派的领导人与各界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民进还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中国的议事日程，到今日已不再仅是新民主主义“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怎样做”的问题。“五一口号”23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整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它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舵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一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宣言》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进作出的重大历史选择和转折。

民进在迎接全国解放的同时，积极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马叙伦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在会议发言中，马叙伦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表示要在历史的转折中改造自己，用最大的努力，从事经济、文化建设，与全国人民和各党派一道，共同建立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1958年6月5日，长期卧床休息的马叙伦在护士的帮助下走下病床，留下了最后的字迹：“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既是马叙伦对自己一生革命生涯的高度总结和升华，也是留给民进的政治嘱托和宝贵财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进自觉接受中共领导，同中共亲密合作，共同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的时代。在强起来的新时代，民进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题的提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点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重大命题的创造性就在于，它不仅真实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强不息、固本开新的奋斗历程，深刻地表征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负人民、守正出新的信念信仰，鲜明地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与时为新的雄心壮志，同时更是从总体上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砥砺前行、行稳致远、可大可久、善作善成的永恒精神法宝。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主任、教授〕

种束缚，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持续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多层次人才，缔造了“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景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不断集聚人才这个第一资源，不断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为事业发展提供不竭的原动力，在未来竞争中占据领先优势。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委宣传部）

梁冀其人

梁冀的高祖梁统，是安定乌氏人。当两汉之际，梁统先与窦融割据凉州，而后加入到刘秀政权中，可以说是东汉创业功臣之一。梁统之子梁松娶光武帝女舞阴长公主，另一子梁竦的两个女儿都嫁与汉章帝为贵人，小贵人生汉和帝。即将显贵的梁氏突遭大难。因为汉章帝窦皇后将和帝养为己子，担心此后梁氏得志，便将两个梁贵人杀害；又诬陷梁竦谋逆，同样将其害死，家属也都迁徙至九真。直到窦太后死去，和帝执政，梁贵人才得昭雪。

如此巨大的打击并没有彻底击毁梁氏家族。到了梁竦之孙梁商这一代，梁氏的地位更加显赫。梁商的女儿和妹妹全被汉顺帝纳入掖庭，特别是梁商的女儿被封为皇后。梁商为大将军辅政，他虽然虚己进贤，但是懦弱无威；二子梁冀、梁不疑和宦官交结，多行不轨。梁商死后，子梁冀被顺帝拜为大将军辅政。此后东汉进入了梁冀执政的近20年时间，东汉的政局也一步步走向衰亡。

梁冀凭借父亲和妹妹的因由，得以担任大将军，本人却没有什么政治能力。《后汉书》本传称他“裁能书记”，也就是仅仅具备初级读写算数能力罢了。但是在各种娱乐活动上，梁冀是绝对的行家。据说他“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鹰隼走狗，骋马斗鸡”，是一个纯粹的纨绔子弟。

梁冀性格暴戾，心狠手辣。当梁商还在世时，洛阳令吕放为梁商亲信，多次说道梁冀的过失，梁冀竟派遣刺客暗杀了吕放，又推说此事乃怨仇所为，进而残杀吕放宗亲、宾客百余人。担任大将军以后梁冀更是肆无忌惮。他向扶风富人孙奋借5000万钱，以马乘为抵押，孙奋只借与他3000万。梁冀大怒，诬陷孙奋母亲原来是自家看守财库的婢女，家产均是盗窃归家所得，于是将孙奋兄弟收监拷打致死，吞没其家财产。

不过与诬枉良人、刺杀官吏比起来，梁冀在朝政中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肆无忌惮。

朝堂上的争端

汉顺帝驾崩之后，年仅2岁的刘炳被立为皇帝，是为汉冲帝。由于皇帝太过年幼，梁皇太后临朝秉政。不过数月，汉冲帝又崩。此时必须从宗室中选择一人做皇帝，太尉李固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宜立为皇帝。他以周勃、霍光立汉文帝、汉宣帝的历史经验劝说梁冀，希望能“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后汉书·顺冲质帝纪》于冲帝崩后记载“清河王蒜征至京师”，说明李固的主张一度要成为现实。不过梁冀顾虑选年长有德者为帝，不利于梁氏外戚继续执政，还是与太后选择汉章帝玄孙刘缯为皇位继承人，是为汉质帝。

新立的汉质帝仅8岁，按说便于梁冀把控。但是质帝为人聪慧，一次朝会时目送梁冀，说道“此跋扈将军也”。可想而知，质帝成人之后必然会对梁冀不利。听闻此事后，梁冀怀恨在心，令左右进毒药毒死了质帝。汉质帝临死前急召李固入宫，最终死在李固怀中。

东汉又一次面临选择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人商议，共同建议梁冀，为国事计，必须立长君，仍推荐清河王刘蒜。这时，梁冀的妹妹将嫁与蠡吾侯刘志，中常侍曹腾等建议梁冀立刘志为帝，以防清河王日后严明，彻查梁冀种种恶行。在梁冀的专横下，刘志被立为皇帝，是为汉桓帝。

过了一年左右，有人谋立清河王为天子，梁冀诬陷李固是幕后主使，将他杀害。李固临死前，留给往日同僚胡广、赵戒一封信，提到“何图一朝梁氏谬选，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王子今教授由此评价李固等汉末士人群体，“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动荡年代我们

从跋扈将军梁冀看东汉的外戚政治

□ 曲柄睿

民族精神中极其珍贵的刚直的‘脊梁’”（《汉末“三李杜”》）。李固等士人的形象，由梁冀这样的外戚衬托而愈加高大。

必须看到，外戚秉政，是两汉固有的政治传统，它曾经发挥过作用，但也因其内在的保守性导致东汉政局的衰微。

外戚秉政

汉代政治一个非常典型的特色就是外戚秉政。与后代外戚有限度地介入朝政不同，汉朝外戚可以直接把持朝政。汉武帝设立内外朝制度以后，外戚往往担任大司马大将军这一内朝领袖官职。在东汉，外戚又加上“录尚书事”的职权。他们控制住了批阅奏疏、传达诏令的关键职务，对人事任免、财政调拨、内外征伐等事务都有发言权和决定权。

外戚秉政与他们在王朝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密不可分。

徐冲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从中古史学中《外戚传》设立的角度思考汉代外戚的政治地位，很给人以启发。他考察《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认为外戚更多是“太后之父兄辈与皇后之父辈，即当朝皇帝之母族与妻族中居于帝之长辈地位者”。最重要的外戚是“帝舅”，亦即与皇帝存在“长幼”关系之人。进而他提出，外戚以大将军辅政、掌握禁兵等工作，并非仅仅因专权获得利益，更是需要对皇帝承担的责任。外戚是王朝权力结构中重要的支持力量。《史记》《汉书》的《外戚传》都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

如此看来，外戚在汉代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特别是在皇位继承的关键时刻，外戚往往要保护太子顺利登基；在新皇即位后，外戚更要帮助皇帝度过熟悉政务的最初几年。可以说，外戚是两代皇帝之间的临时执政者。

回顾汉代的几个主要外戚，莫不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如霍光扶持汉昭帝、汉宣帝，史丹扶持汉成帝，即便是本文提到的梁冀，也扶持了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不同之处在于有些外戚并不贪恋权势，而梁冀的野心过于膨胀。

但是一个政权如果要平稳发展，不能仅仅依赖某几个当轴者的道德自觉，更需要制度保证。很明显，汉朝只提供了外戚秉政的制度，却没有安排限制外戚权力的制度，终究使得外戚权力过大削弱了皇室的权威。

也正因为外戚对皇权的巨大影响力，引起后世的警惕。曹魏建立之后，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颁布诏书，限定外戚权力。诏书中说“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禁绝了外戚干政的传统。曹魏此举，正是鉴于前后两汉外戚权力过大导致国运衰微的历史教训。

两汉风云